创作家可能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批评家干什么?那就是得把创作家尽得的风流给讲讲清楚。一般人看诗往往满足于雾里看花,不求甚解,生怕看穿了就不美了。但事实并非如此,真正的美经得起最锐利的目光。

尽得风流

■郑珊珊

《诗的八堂课》,江弱水著,商务印书馆2017年1月出版,34.00元

中国是诗的国度,但诗学却一向不太发达。大抵是国人觉得诗学不如诗美,或诗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种误解颇为根深蒂固,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江弱水先生在新著《诗的八堂课》里说道:“创作家可能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批评家干什么?那就是得把创作家尽得的风流给讲讲清楚。”这句话讲的也是诗与诗学。诗负责风流,诗学负责把诗的风流给讲讲清楚。一般人看诗往往满足于雾里看花,不求甚解,生怕看穿了就不美了。但事实并非如此,真正的美经得起最锐利的目光。江弱水先生就具有这种最锐利的目光,他用八堂课的工夫,尽得诗的风流,引领我们初窥诗学的堂奥。

课堂的讲题设置颇具古风:“博弈第一,滋味第二,声文第三,肌理第四,玄思第五,情色第六,乡愁第七,死亡第八。”但实际上书中旁征博引,不分古今中外,征用了中外文学史上大量的著名诗人与批评家,既有刘勰、俞平伯、卞之琳、张枣,也有莎士比亚、福楼拜、叶芝。书小而薄,作者却纵横恣肆,在诗论领域开拓了广阔的疆域,这正是要告诉我们:诗是世界性的艺术形式,所有人不分地域不分民族,都能够领略诗之美;而全世界的诗人,都在吟咏一样的主题:玄思、情色、乡愁、死亡……

第一课“博弈”大概最为别开生面,谈的是诗的发生学。“诗的写作,说白了,有的像是赌博,有的像是下棋。或者说,有时像是赌博,有时像是下棋。”其实是比喻诗人中的灵感派与技艺派。前者以里尔克、李白、苏轼等天才型诗人为代表,后者以艾略特、杜甫、王安石等推敲型诗人为代表。但两派绝非水火不容。作者指出,天才如李白,也“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可见铁杵磨成针的传说加在他头上,只是要告诉我们赌徒是怎样练成的”。赌博型的写作总归是小概率事件,大多数诗人都是“赌博和下棋交替使用”。最高境界,应当是“用弈棋型的手法来制造赌博型的效果”,“不可无匠心,不可有匠气”。在谈论过程中,作者始终在寻求中西诗歌与诗论的契合点,最终他也引导我们发现,无论古今中外,诗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后面的七堂课讲诗的鉴赏论和诗的主题,同样用融通中西的方法,向我们展现最广阔的诗歌世界。

在理论阐释的同时,作者不忘文本细读。每一课里都设置了“有诗为证”的环节,通过对具体诗例的分析解读,让诗学妙谛更容易使人理解。如“声文第三”中,以李清照《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为例,探讨语言姿态观。作者先引前人词家所言,提到《一剪梅》这个词牌历来被认为俗调,不易填好,但李清照却写得美到极致。怎么个美法呢?作者指出,除了融汇各种古典意象之最美者以外,“就语言形式而言,七四四,七四四,仿佛优雅的舞步:七个字往前走,然后,四个字一徘,四个字一徊;再七个字往前走,又四个字一徘,四个字一徊。在行进和徘徊之间,真是顾盼生姿”。作者采用比喻把词的语言姿态活化了,让读者直观地感受到其中包含的韵律。这首词曾被流行歌手演绎过,传唱度很高,但恰恰也是流行歌曲遮蔽了这首词的古典语言姿态之美。读过此书,方重新品味到古词的音韵回环之妙。

在现当代,语音的特殊表现力确实已久为诗人所忽视。基于此,作者对卞之琳与张枣最为推崇,称他们是“二十世纪中国现代诗人中顶尖的技巧大师”。卞之琳诗中有很多精巧的声韵设计,如《白螺壳》中连用五个“穿”字,音韵流转,出色地模拟了风、柳絮和燕子穿过小楼的动态。而张枣在诗中挪用钱锺书生造词“载蠕载袌”,呼应上一句的“普照”(“蠕”呼应“普”,“袌”呼应“照”),音韵交叉相合,化臭腐为神奇。正是这些细节的解读,把诗人尽得的风流都讲清楚了,也让读者对理论的理解更加深刻了。

真正的诗论不但要点评诗歌好在哪,也要指出其不好在哪。朱庆馀的“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已是千古名句,大多数文学爱好者都知道这是诗人应试之时,借用新妇的忐忑心情试探考官大人的评判结果,历来被视为颇具巧思。而作者认为,这不过是“罕譬而喻”的花招,落入下乘的“以事拟理”,达不到“妙合而凝”的境界。而苏轼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就是个寓言式的文本,“像设定好谜底的谜面,有点干”。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大量采用了西方文论观点,但作者始终以中国古典诗学为正统来构建自己的诗学体系。他最终所确立使用的都是中国古典诗学概念,以此容纳西方文论观念,比如以“滋味”来囊括“taste”,以“肌理”统领“texture”,以“玄思”取代“哲学”。这种做法,扩大了中国古典诗学的外延内涵,为中国诗学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对当前学术界聚焦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创新而言,也深具意义。

江弱水先生早年善诗,深受卞之琳先生器重。近年虽不大写诗,但写起诗论来仍是妙笔生花,文字流丽。配合作者精选出来的诗歌,全书的阅读都给人以美的享受。本书是在课堂讲义的基础上增删修改而成,虽然后记中作者遗憾改了不少“失去了口语的声吻,少了点生动和自然”,但总体读来仍有作者讲课时的娓娓道来之感。而且,一些语言极为生动幽默,讲到苏轼好以味论诗,“真不愧是把名字写在肉上的大食客啊”;他发现香港同学用粤语读王维的《观猎》更为沉雄有力,“这首诗假如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标准音念出来,是打不到什么猎物的”。读到这里不免莞尔,这就是大家之风,举重若轻,深沉的理论在他的笔下,也轻松活泼。书里提到,“好诗人能发出好声音,而最好的诗人发出了最好的声音”。在我看来,这本书也发出了当代诗论界最好的声音。

《形影不离》中人物、角色众多,薛涛为每一个人物和角色预设了标签和符号。其中,小菊爸爸是最具涵义、直指生命本质的形象,他代表人类被囚禁的极端状态。

深意暗藏的《形影不离》

■孙 悦

《形影不离》,薛涛著,青岛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23.00元

薛涛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形影不离》和他以往的作品相比,存在着很大不同,在风格上有寓言的美学特征。这部小说更玄虚,更隐喻,也更带有哲学意味。小说中充满象征和寓意,是一部意象感大于形象感、意味大于情节的作品。阅读中,读者会不知不觉慢下来,停一会,琢磨一阵,再继续读下去。所以,这是一本需要费些力气才能真正读懂的书。这种感受,与阅读德国作家米切尔·恩德的名作《毛毛》的体验有些相似。

《形影不离》中人物、角色众多,薛涛为每一个人物和角色预设了标签和符号。和尚象征参透俗世本相、灵魂宁静无求的人;旅行家象征喜欢挑战、无惧跋涉的人;乌鸦象征人对既有权威和积习秩序的执行;蓬头先生象征混乱、无知和贪婪的人性;玲珑奶奶象征人们心事重重,每天在琐碎的惦记、牵挂、担忧、唠叨中度日。其中,小菊爸爸是最具涵义、直指生命本质的形象,他代表人类被囚禁的极端状态。如柏拉图所说,人类的灵魂被禁锢在肉体里,失去自由,小菊爸爸就是要从这样的牢笼中冲出去。他讨厌一切狭小的空间,他似乎是个幽闭空间恐惧症患者,他试图冲破一切限制行动自由的方式,所以他不断地离家,一直在远行,他“沿着地平线行走,找最宽敞的地方,天空做屋顶,天边做墙壁”。

这些角色的个性,让位给他们各自代表的某一类人,某一种人性(动物性),某一样观念,某一个概念,或某一些特征。显然,作家薛涛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就是要堂而皇之地给这些角色贴上标签,让他们的象征意义饱和。因此,作家为人物设计对话,也与他从前的小说策略不同,这些对话在推进情节的同时,更主要地承担了暗藏玄机、完成象征、到达彼岸的任务。不论性别、年龄、职业,这些人物大多带有思想者气质,语言具有启示性,一个木匠家的老太太可以说出“我看你是财迷心窍,忘记了最根本的东西。大风能带走的是心思轻的人。心思重,安上翅膀也飞不走”。一条黄狗会规劝乌鸦“没有谁永远属于天空。不管是谁,最后都回到土里面”。一个琴师和小菊的爸爸对话:“你不会笑,是因为拥挤吗?”“笑需要一种力量,我好像丧失了那种力量。”“我在找丢掉的东西,这辈子我丢掉很多东西。人一生下来就丢东西,你也不例外。”“匆忙奔走的路上,也要微笑。现在你微笑一下,就有琴声送你走出这段路。”

《形影不离》传递出作家薛涛的人生顿悟和哲学思考。来自风镇(那是不是丰都的另一个名称呢?)的乌鸦,是贯穿小说始末的重要角色,它是精神领袖,也是毁灭和死亡的象征。臣服于它,人沦为失去自由的奴隶,被永远困在一个时空匣里,等待死去;征服它,人获得超越宿命的新生,灵魂摆脱了肉体的羁绊和局限,随意赋形,来去无踪。小说中,最初乌鸦不喜欢小菊的歌声,它呱噪不安,阴险无情。后来,它被歌声所染,目光里开始闪耀光辉。乌鸦定位自己是“旁观者”,旁观芸芸众生自生自灭,后来却变成了一个“参与者”,引领小菊,闯过道道关隘。可见,作家薛涛终究是慈悲的,他让那不动声色因而洪荒得冷酷的造物,最终还是投射一缕柔情给这世间无辜而无知的万物。小说中写,乌鸦站在树上思考: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要去哪里。这三大终极追问,在世俗文化中无解,在哲学层面引发焦虑痛苦。“灵魂和躯体,谁是王?”乌鸦推动小菊的“道行”上升了一个级别,小菊借此“渡过了一个心理难关,她终于能忽略乌鸦的存在了。乌鸦的存在是一个杂念,忽略它就是减去一个杂念”。这里暗合了中国佛教文化中“空”的境界、道教思想中“坐忘”的禅机,所谓境由心造,人在内心里营造自己的风景,外界的景就不能入内了。参透“空”的境界,人获得真正的解脱。小菊唱戏给众生听,她唱了什么呢?《天女散花》,“云外的须弥山色空四显,碧钵岩下觉岸无边”。“天女散花”的故事源于佛经,仙界佛国的一派气象,散发着超凡脱俗的清静,令人内心如如不动,在浊气四散的红尘世界,这清凉剔透的状态实难求得。小说中还曾描写,当小菊和众人被困在风镇的时候,一个和尚却借着风轻飘飘地飞出去了,小菊看见,“和尚的表情是安详而满足的”,显然,作家再一次表达了他的一种体悟——宗教层面对生命和存在的观照,能让人的心灵获得解脱,帮助人类证悟生命的意义和世界本相,斩断人类对失去(死亡)和囚禁(欲望)的恐惧。小说最后,小菊和爸爸在白云观里相会了。王阳明有诗:“一自移家入紫烟,深林住久遂忘年。山中莫道无供给,明月清风不用钱。”这明月清风的白云观,既是他们父女团聚的地方,也成为生命抖落枷锁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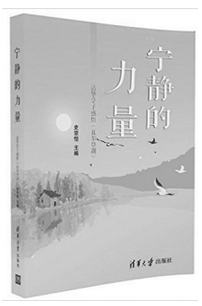
《形影不离》中,“唱戏”这一行为,亦具有象征意义。一旦小菊唱戏,就会让天地动容,林木哗然,万物澄澈,若是人,则变得沉稳和善,贪婪、蒙昧、堕落等东西被搁置,回归人之初;若是动物,则开心通窍,增长智慧,忘记猎捕,不再对峙。结果,无论是人类社会,还是动物世界,都安静下来,祥和一片,大家友善相向,推远争斗。有小菊在的地方,就是理想国。唱戏,歌声,寓意直抵生命本质的震撼力量,它是艺术,是灵魂交响,是天地间通用的法则,是与宇宙同频的哲理,是超越一切生命体各自局限的共有秩序,是那悬在万物众生头顶永恒的存在,是用爱的双翼滑翔在生命起源和终点两级的永恒的造物。小菊的歌声能够征服一切,改变一切,直至左右一切。因此无论是乌鸦,还是老熊,无论是无良富翁,还是唠叨妇人,甚至是一粒深埋地下的种子,都会被小菊影响,变得和从前的自己不一样,变得更好,更完善。小说中写道“如果不一起听戏,老熊和野兔怎么做朋友?如果不一起听戏,鹰隼敢落在老熊头顶吗?”“一起听戏”是又一重象征,指向平等、共同利益,指向同心同爱、同一的行动准则和审美趣味,同一的人生目的和生活方式。作家薛涛在这部小说里,一直不断接近一种至善至美的生命构成和精神状态——无我,无他,无分别,万物相融,“人和狗各说各自的话,这对话是两条并行的河流,无法汇入对方,却能一同汇入大海”。

和从前的创作相比,有一点没变,那就是薛涛依然是个写景状物的高手。“桥下的深潭盛着一块瓦蓝的天空,天空四周嵌着茂盛的青草和各色野花”,“一片褐色的麻雀飞起来,散进前面的核桃林”,“甸子枯黄,水潭清瘦,水鸟们的穷日子来临了”,“一阵风从年轻的森林冲出,恐惧和寒意也一起袭来,小菊缩成一团”……一切都是淡淡的,清清的,恰如暮鼓晨钟里辽阔而遥远的夕阳。

《瓦尔登湖》不是关于我们如何隐逸,而是关于我们如何强大起来,强大到我们无论身处何种情境、无论面对的是顺利或挫折,在一切人生枯荣沉浮的时空里,都能与整个现代世界历史中的等级分类、价值秩序,平等地对话博弈,推动其移位、重组和更新。

再读《瓦尔登湖》

■颜海平



《宁静的力量:清华学子感悟〈瓦尔登湖〉》,史宗凯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46.00元

初读《瓦尔登湖》是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求学的初期,依稀记得当时比较留意的是与作者同时代的英国女作家乔治·艾略特对其中自然景色描叙的欣赏,还觉得与中国大地山河的史诗传统相比,似稍单薄。此书成为藏书之一,就此没有再读过。然而,就像故事里说的,“很多年之后,”清华大学邱勇校长为2016级新生赠书《瓦尔登湖》,使得阅读此书,成为3500名莘莘学子成年之礼、人生起步的重要事件。我开始试图回想自己当初的阅读,要为学生的读后感写文章,又感到需要了解校长选择的中文版。书终于到了,学生的读后感长编终于到了,一个相对安静的周五晚间也终于到了。

《瓦尔登湖》成就于19世纪中叶的新英格兰,美国文学文艺复兴时代的重镇和标志。对梭罗极为欣赏、将其认作新型人类和精神同道的鲁道夫-爱默生,正与同道者一起设置“文化美国”的核心议题,撰写出版的《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是一份划时代的呼唤,独立于欧洲的“美国思想与哲学”宣言,为之后一百年间世界格局的大迁移,欧洲的移位和美国的飙升,奠定着精神文化的基调和基础。当时的美国,经济发展趋势强韧,在数十年内超过欧洲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已不仅仅是诗人梦想家的预言。同时,世界范围内,古老欧洲仍被认作精神文化的源泉和高地,而“文化美国”是“边缘地带”的同义词,不在世界文化的中心。林中写作的梭罗,一方面最大程度地遍寻“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思想情感”,尤其是遍读英国语言写就的宗教、哲学、文学、历史作品,将自己在其中发现的结晶,如闪烁露珠,遍布在他的树林湖水、字里行间。同时,《瓦尔登湖》当然不是一部“普遍真理选编”,这里的核心是将人类思想情感的历史精华使用化用在对自身所处之“边缘性”的深思、重写和升华中;有如他之后马克·吐温笔下的哈克贝利·芬,梭罗将“边缘之地”的历史条件作为自己全部生命的中心特质,并将其提炼成一种独特的文学风格和生命形式:“林中生活”作为一种意义生命的实存,一场拓展现存世界之极限的精神奋斗,是《瓦尔登湖》的密码和真谛。

清华同学对此有着一种敏感的直觉。他们似乎感觉到这位美国作家和作品的某种特质、异质,称其为“奇怪的梭罗”,“别一本圣经。”诸多来自天南海北、不同专业的同学认为,《瓦尔登湖》并非要求人们遁世,“梭罗不是陶渊明”,而更是一份关乎人生可能、道路选择的叩问。对于90后的中国高校学子,在国家快速日趋强大、大多家庭生活稳定的境遇中,梭罗更像是异于日常的一种挑战性呼唤,阅读者藉以思考如何脱出日常惯性,思考如何为自己在这个人生世界中做一番安放,以不仅获得有职业的存在,还要获得有意义的存在, 在生活方式的选择和发展道路的命题面前,有所创造。

北中国的月色透过窗子,带着风恢弘地旋过,倾听着窗外的恢弘和学生的文字,我感受触摸着这一“奇怪的梭罗”,“别一本圣经”的气息和脉搏。东部藤校欧洲导向的人文教育传统,使得人们习惯于将这一新大陆的文学艺术作为老欧洲的衍生地带,将梭罗的木屋与华尔华兹的湖畔相比较,将《瓦尔登湖》与英伦三岛或大陆欧洲和现代大工业孪生而逆动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相连接。然而,梭罗对大工业时代前的殖民拓荒农垦经济基本否定,毫无怀旧气息。在他对火车钢轨高速喧嚣四处蔓延囊括世界的愤怒中,没有中世纪田园牧歌的回光返照,没有欧洲贵族城堡的变奏诱惑。在他对商业交易工具理性之价值逻辑质疑的表述内部,激烈地活跃着的命题,是如何整体性负责任地认知巨变中的世界,和自己在其中所拥有的这一个人生。大工业如风暴呼啸而来,重组着土地河流、山林生灵、人群区域、时空经纬、直至人的生活和人的存在形态本身,以超出人们直接经验所能把握的规模和速度,生成和建立全球性相互依赖的生产、流通和分配机制与网络系统。这是一个有中心和边缘、局部和整体、特殊和普遍之区别的系统,充满张力、矛盾甚至危机的系统。梭罗对此作出的回应和选择,是以他对巨变湍流中生灵万物的边缘性、局部性、特殊性的体验方式、描述方式,揭示出深蕴其中的普遍价值和恒长意义,并以此叩问那构建边缘和中心之等级关系的分类认知体系,及其世界历史。确如同学们在读后感中所说,梭罗并不邀请遁世之人,而更多地是建议我们,试一下悬置历史风暴中可能随波逐流的小我常态,试一下以谦逊而真实的勇气,去把握巨变中的大整体,以获得我们置身其中的根据。《瓦尔登湖》不是关于我们如何隐逸,而是关于我们如何强大起来,强大到我们无论身处何种情境、无论面对的是顺利或挫折,在一切人生枯荣沉浮的时空里,都能与整个现代世界历史中的等级分类、价值秩序,平等地对话博弈,推动其移位、重组和更新。

这梭罗式的强大,一方面充溢着个体在完全独立中开拓疆土、建立生活而臻成熟的美式神话,同时是对这一神话的深刻改写。《瓦尔登湖》精神气质的特征不仅包括个体独立的践行,而且包括对人类之道全在于创新的坚信:“在那儿住不到一星期,我的脚就踏出了一条小径,从门口一直到湖滨;距今不觉五六年了,这小径依然还在。我想是别人也走了这条小径了,所以它还在通行。大地的表面是柔软的,人脚留下了踪迹;同样的是,心灵的行程也留下了路线。”生活之要义不是遵循现存的路标,而是创造生命方式的新航线。“至少我是从实验中了解这个的:一个人若能自信地向他梦想的方向行进,努力经营他所想望的生活,他是可以获得通常还意想不到的成功的。他将要越过一条看不见的界限,他将要把一些事务抛在后面;新的、更广大的、更自由的规律将要开始围绕他,并且在他的内心里建立起来;或者旧有的规律将要扩大,并在更自由的意义里得到有利于他的解释,他将生活在事务的更高级的秩序中。”这更广大的规律、更高级的秩序的灵感源泉,来自新大陆清教信仰在人世间另辟道路的自赋使命:“创世纪的诗篇至今还没有中断,可惜听到它的耳朵太少了。”一部新英格兰清教世俗化存在的见证,新大陆欧裔主流精神自传,同时是对其文明价值的改写和超越;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通过某种完全独特的方式得到升华和开阔,不仅是对自身一切的拥有(梭罗对美国由财产拥有而获得身份的民族认同基础,采取了相当激进的超越立场),更重要的是由此和人类全体形成和保持着联系。

窗外晃动起晨炼学生的身影和欢语,我读完了学生们的读后感,满心是无言的喜欢和谦逊的骄傲。